

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

夏文斌，郭东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全球治理面对的重要课题。如何回应世界各国关切，破解全球治理难题，需要我们从具有五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寻找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对重塑全球治理价值理念、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全球治理的困境和挑战，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功能出发，积极探寻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的新路径，为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

关键词：全球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2)04-0001-15

引言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大趋势。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相互依赖和融合发展的程度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的全球性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全球治理因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兴起，以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为价值导向，旨在构建大国协调与国际合作的治理机制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随着全球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信任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理念迫切需要在识变应变求变的过程中重塑。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要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做全球治理变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世界瞩目成就的同时，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履行大国担当，中国倡议、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赞同，在解决全球性事务、地区性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2021010004)

[作者简介] 夏文斌(1962—)，男，安徽天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郭东升(1994—)，男，新疆阿克苏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①。因此，破解治理难题，弥合治理赤字，需要深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丰富全球治理价值理念贡献力量。

一、当代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全球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信任赤字有增无减，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因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和西方世界整体下滑而陷入结构性困境。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双重标准”、“毁约”、“退群”等更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解决全球性危机设置了层层阻碍。

（一）发展赤字不断扩大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分化调整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南北差距、社会贫富差距更加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发展赤字不断扩大。

第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内在影响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无论世界经济如何变化，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不会消亡，由此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以周期性爆发的特点在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存在。经济全球化虽然能够使经济危机在时间（金融信贷）和空间（区域转移）维度上得到缓和，但是并未根本性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换言之，经济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长短和规模大小的问题。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必然会迅速向全球蔓延，从而引起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二，发展鸿沟的加剧制约全球协调发展。一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垂直型分工导致发展路径固化，不断拉大发展差距。发达经济体凭借技术优势把控产业链中高附加值部分，而发展中经济体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由此两者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二是人均收入两极分化严重，贫富鸿沟不断加深。瑞士信贷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世界45%的财富，较2019年上升1.1%；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世界82%的财富，较2019年上升0.9%；而全球最底层的50%人群拥有的世界财富不足1%^②。三是全球经济贡献与全球治理话语权不匹配。世界银行2022年1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仅增长3.6%，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3.8%，发达经济体增长3.3%。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持续上升，经济增速高于发达国家，但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较弱、代表性不足。话语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仍由少数西方国家掌握（吴志成和刘培东，2020）。

^①习近平．举旗帜 聚民心 育新人 兴文化 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1)．

^②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1[R]. Switzerland: Credit Suisse, 2021.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以维护贸易公平和保护国家产业为由,贸易保护主义掀起了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通过设置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产品和要素流动,严重阻碍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赵浩和赵景峰,2022)。一方面,按照贸易补偿原则,推行平衡本国贸易受损者利益的保护措施,提升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设置技术性壁垒,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以维持其在知识资源上的先发优势和垄断地位(赵浩和赵景峰,2022)。由此,发达国家采取制造业回流或扶植依附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干预措施,以及通过征收专利使用费和侵权调查等方式制造贸易摩擦,企图重构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例如,欧盟出台具有保护性的《供应链法》草案,修订《对外贸易和支付法》,进一步强调要打造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强化对重点领域技术自主权把握,严格审核非欧盟国家投资。美国更是多次启动“特别301条款”,不仅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限制对华技术出口,而且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拼凑所谓“民主科技联盟”“民主供应链联盟”“新经贸规则联盟”,极力围堵中国。这极大地阻碍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严重损害了国际分工参与国利益,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冲击。

(二) 和平赤字日趋严重

当前,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稳定局面正面临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不断上升,民粹主义和“普世价值”给各国发展带来困惑,“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跨国争端和地区冲突不断,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第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世界和平与社会稳定失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霸权主义以“强大必霸、有霸则稳、无霸则乱”的霸权稳定论为理论依据,认为稳定的秩序是由霸权国提供的,霸权的消长取决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但从现实来看,“霸权主义带来稳定秩序”以及“负担过多成本导致霸权衰落”的观点是难以立足的。霸权主义带来的只有“坚船利炮”的侵略史,以维护“人权”和“民主自由”为借口,内外结合搞“和平演变”的“干涉史”,采用一切手段切断一国经济联系的“制裁史”,例如:制造乌克兰危机,挑起“南海问题”,扶持代理人政府进行“颜色革命”,滥用技术权利,实施长臂管辖,主张“美国优先”,随意加征关税,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第二,“普世价值”和民粹主义双重叠加,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陷入治理失范。排他性、扩张性“普世价值”的渗透,以及民粹主义所引起的领土争议、种族歧视、民族仇恨等,导致跨国争端与族群冲突频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基辛格,2012)。不难看出,宣传渗透“人类社会诸多价值是共同的、普遍的”普世价值成为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剥削”的有力维护。“宗教之争”“淡水之争”“领土之争”“石油之争”,加上民族矛盾、政治改革和大国插手干预,遥控“阿拉伯之春”,导演“颜色革命”,施行“和平演变”等,使得地区局势瞬息万变,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三股势力”交织渗透,引发全球安全危机。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交织,民族、宗教矛盾不断累积的作用下,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相互渗透,愈演愈烈,给全球安全稳定造成巨大危害。“三股势力”与人类为敌、与世界为敌,已经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个毒瘤。

(三) 信任赤字日益加剧

当今世界,二元对立和强权至上思维主导下的国际交往合作愈发脆弱,“双标”“造谣”“毁约”“退群”“本国优先”屡屡侵蚀信任基础。治理主体之间信任匮乏,不仅迫使现有合作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陡增,而且打击了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甚至降低了未来继续合作的可能。

第一,双重标准:瓦解国家信誉。个别国家在历史上就有基于一时利益而背信弃义、大行双重标准之道的传统。例如:在防止核扩散协议上,印度和朝鲜都违反了核不扩散规范,美国与印度进行核合作而制裁朝鲜核计划(阎学通,2013);美国派军舰到别的国家门口耀武扬威,叫嚣“航行自由”,自己却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干涉他国内政,自身却不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重要人权公约的缔约方。实际上,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在许多问题上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和采取“双重标准”,不遗余力抹黑他国和颠倒黑白。个别国家的种种行为在严重损害客观公正的同时,也瓦解了自身的国家信誉。

第二,政治操弄:辜负民众信任。个别国家以意识形态标准划线,不断挑战道德底线,推诿甩锅,造谣欺骗,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事件中,部分国家政客罔顾事实,造谣污蔑中国抗击疫情所做的牺牲和贡献,妄图“追究”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责任”,借以转嫁和逃避其抗疫不力、贻祸全球的罪责。对此,乌干达智库发展观察中心创始人、知名学者塞曼达指出,美国毫无根据地不断炒作“实验室泄漏说”,无非是要将病毒溯源政治化,转移人们对美国政府应对疫情失败的注意力,企图借此搞“勒索外交”,为其阵营赢得政治加分而已。这种散播“政治病毒”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破坏了国际抗疫合作,也无益于本国疫情防控,终将与国际社会主流民意离心离德。

第三,中心主义:背弃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强调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遵守信义。实际上,个别国家将自己作为制定规则、实施规则的中心,无视国际组织、国际协议条约的存在,频繁地“退群”“毁约”,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反映出其对契约精神的严重背弃,极大地损害了各国之间的信任基础,加剧了全球信任赤字。

二、全球治理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命脉,也是全球治理的智慧之源。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重塑全球治理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讲仁爱：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

“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髓，蕴含“克己复礼”“爱人”“齐物”“兼爱”等崇德向善的深刻内涵，表明了由爱亲、爱人到爱万物的宽厚包容、博施济众之心。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的道德自觉；庄子提出“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的爱人爱物之举；孟子主张施行仁政，“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宣扬由爱亲人推之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推之爱万物，最终施行仁政的理念；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融通墨子“兼爱”思想提出“博爱之谓仁”的核心观点。“仁爱”思想中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就是实行“仁”的根本途径，包含着“情”（爱心、同情心）与“理”（理性的要求）的统一（冯契，2015）。“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表明“仁之方”就是用推己及人的方式来实行“仁”。肯定人的尊严，尊重、宽容、爱戴他人；肯定人同此心，每个人都能理性判断是非、善恶。“仁爱”思想囊括的仁心仁行发展程序和礼治秩序，对社会道德生长和秩序维系有着重要意义。“君子必先修身，道备于己，然后齐家、治国以迄于平天下”之理想，体现了“仁爱”思想将个人德行修炼融通于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内生逻辑（萧公权，2018）。“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大学》），“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表达了施仁政对民心相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正所谓，“个人之仁心为政治之起点，天下之归仁为政治之终极”（萧公权，2018）。因此，全球治理需将“以怀仁心施仁政达天下归仁”作为价值引领，为重塑全球治理理念奠定重要基础。

（二）重民本：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标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目标。“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治理中，逐步形成了以“畏民、敬民、忧民、抚民、利民、富民、养民、教民”等察民情、聚民心、重民意和惠民生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李怡和肖昭彬，2017）。“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四顺》），均体现了民众为国家之本、民心为国家之基的重要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道德经》），“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四书章句集注》），均体现了体恤爱护民众的“民贵”思想。“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体现了民富则安、民富国强的深刻道理。可以说，国家兴衰、政权得失和社会安定的关键在于人心之所向。因此，全球治理需始终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用实际行动赢得民众的尊敬和信任。

（三）守诚信：全球治理的规范要义

守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①。一方面，诚信既包括“诚”，即真诚、忠实的为人准则，也包括了“信”，即信任、

^①王志民. 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N]. 光明日报, 2014-07-22(16).

守信、不欺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诚与信相融相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诚是信的前提，信是诚的保证；诚是信的内在自觉，信是诚的外在展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守诚信不仅是个人的交往原则，而且也是国家交往、交流、合作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正如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①。讲信义、守信用是个人、民族和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根本。相反，如若不讲诚信势必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和治理的失序。荀子有言“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荀子·强国》）。如若没有信任，误解、猜忌、隔阂将会充斥着整个社会，极大阻碍国家间的沟通与合作。守诚信就是不能出尔反尔，对于约定好的事情，要言出必行。一个国家对内要维护信用，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对外要建立信誉，才能形成积极影响力，为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因此，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交流，需要我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信守承诺。为此，当今全球治理需将守诚信作为规范要义，促进互利互信，夯实交往基础，优化全球合作环境。

（四）崇正义：全球治理的进步方向

正义是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目标，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永恒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包含人的行为的“正当”与“公正”，如“义者，宜也”（《中庸》），还包括社会制度评判上的“合宜”与“公平”^②。如“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正义”思想还包括“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等观以及“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的公平观。现如今，正义的内涵可以拓展为更加注重以“仁道高于权利”为价值前提的“得其需得”，并行于罗尔斯强调的以“平等高于应得”为价值取向的“得其应得”，有效避免了权利获得的偶然性和初始禀赋的差异性所蕴含的实质的不平等，从而构成了正义的另一重维度（杨国荣，2021）。崇正义就是以仁道的方式通过资源调节再建社会平衡的过程，讲究“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性平等。“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表明以符合义的标准去践行，就是有德行的，这个义就是指匡正某种行为使之合乎正当的事物、正确的意义（邓勇，2007）。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注重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并指出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是一种“至善”，也是最大的正义。因此，正义不仅意味着个人权利的最大化，也意味着整个共同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俞可平，2017）。为此，全球治理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五）尚和合：全球治理的前提保障

“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蕴含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以和为贵”等丰富内涵，对于调和矛盾、化解分歧、减小摩擦、缓和冲突等具有重要作用。尚和合的首要前提是要正视差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

^①人民日报评论部. 习近平用典：第二辑[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65.

^②杨朝明.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N]. 光明日报，2014-07-29(16).

子·滕文公上》)。每个人、政府、社会、国家，每种制度、文化、文明都会有其异同，这是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和而不同”主张通过协调“不同”，从而达到协调统一，暗含着在尊重差异、正视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谋求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共生之意。以和为贵强调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将和气、和睦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谋求和平共处的友好发展。尚和合蕴含着平等共生、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是推动国际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安全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①。因此，当今全球治理需坚持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构筑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环境。

（六）求大同：全球治理的理想追求

“大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崇高理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先贤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礼记·礼运》中描述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段描述表达了人们对天下一家、自由平等、诚实守信、仁爱慈孝、选贤举能、友爱互助的崇高追求，以及对太平盛世的美好憧憬。天下大同理想在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中，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即从“据乱”到“升平”（小康），再到“太平”（大同）的演进思路。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主张“天下为公”。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当代中国之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他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当前，战乱和贫困依然困扰着部分国家和地区，疾病和灾害也时时侵袭着众多的人们。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②。因此，当今全球治理需将“世界大同”作为崇高理想追求，共筑人类社会的美好明天。

三、运用中国智慧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是防范和化解全球治理安全隐患的“基因库”和“百宝箱”。针对当今全球治理理念缺位、治理失灵状况频发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功能出发，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治

^①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9-04(2).

^②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17-01-01(1).

理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寻求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的新路径,为全球治理的公平正义提供新的动能。

(一) 民胞物与、仁及天下,以尊崇仁爱之心作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

“仁爱”思想推崇“爱人”,强调“克己”,尊崇“仁心”,施行“仁政”,倡导“礼治”,对构建仁爱社会,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持仁爱之心,行仁爱之道,构建天下归仁的理想仁爱社会,能够促进全球治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仁爱思想所倡导的存仁心、施仁政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秩序、消除矛盾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建构起内外部治理良序。一方面,用“仁爱”思想浸润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能够将具有负外部性的社会行为约束在个人品性的修炼中,从而显著降低治理成本;另一方面,用“仁爱”思想指导建立起来的国际规范,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绝对平等规范引发的国家冲突(阎学通,2015)。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中国将仁爱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之中,以实际行动为人类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例如,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开拓了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泰国原副总理、世界贸易组织原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认为,现在全球混乱、缺乏包容性就是因为缺乏“仁爱”的全球治理,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发展主导的、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之路,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以仁爱之心与天下人民、国家缔结友谊,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仁爱是团结的黏合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①。心相通就是要秉持“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之心,尊重、宽恕、推己及人地为人着想。因此,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心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对内治国要施善于民,仁民爱物;对外与国交往要相互尊敬、平等互待、和平相处,不强迫、不干涉别国事务。这种仁爱之心为推动心相通、民相亲、国相交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是国与国相交的重要基石。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奉行“强权即公理”,以美式民主、自由的名义,进行政权颠覆、军事干涉,攫取他国利益,维护自身霸权,造成国际社会的混乱。可以说,其所倡导的弱肉强食、霸权竞争的“自由世界秩序”以及恃强欺弱的霸权行径早已严重危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与此不同的是,在讲仁爱的引领下,中国人民形成了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结交了忠实的合作伙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上,近百个国家以不同方式反对一些国家用所谓的“人权”幌子来攻击中国,将公然造假、“以人权谋霸权”的拙劣把戏揭露于世。古巴常驻联合国大使佩德罗索就曾提出:联合国大会是否能够通过一项决议暂停美国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以仁爱之心无私奉献,积极开展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共向166个国家

^①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2).

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援助,派遣60多万名援助人员,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累计为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了46亿件防护服、180亿人份检测试剂、4300余亿个口罩等抗疫物资。2022年3月,阿富汗局势巨变,中方更是紧急向阿方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药品,并郑重承诺:愿帮助阿富汗建设改善民生的项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阿富汗的和平重建及经济发展。

中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抗疫合作,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体现了仁爱思想在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国际危机时的奉献与担当。因此,仁爱思想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必将为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构建仁爱社会,助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引领新风向。

(二) 人民至上、全面发展,以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标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超越了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再一次升华,对锚定全球治理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重“民本”思想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中“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执政目标”等重要理念的基础上,将“为人民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有机结合起来^①,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理念。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民、安民、顺民、富民、利民”的合理内核,衍生出了“发展是多数人为主体的发展”“发展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中“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的有益成分,凸显了“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鲜明立场和价值信仰。西方“人本主义”思想重视“抽象的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崇尚个人的力量、理性和价值,不是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去考察人的本质,强调工具理性,从而走向了本该注重探讨人的价值的对立面。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忽视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造成了每个人关心的都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及与之联系的整体利益,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与断裂的状态(李怡和肖昭彬,2017)。近代以来,民本思想蜕变出了新内涵,谱写出了新篇章。孙中山将民本思想与中国的独立自强联系起来,提出了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人民立场,真正实现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邓小平秉承为民爱民、利民富民的价值旨归,提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以及“坚持人民至上”的重要论断,与时俱进地丰富了坚定人民立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民本内涵。

^①朱汉民. 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N]. 光明日报, 2014-07-22(16).

把人类共同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以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福祉为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不同于西方以资本、利润和市场最大化为治理导向,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强调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着重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谋求人类共同发展,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提供了价值遵循。正如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陈锦华,2012)。可以看出,中国对人民负责的治理理念蕴含着关注民众生计、重视人民利益的合理内涵。历史和实践证明人民是历史活动的创造者,人民也是全球治理的主导者,而全球治理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就是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过程(蔡拓,2004)。因此,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祉作为治理的根本目标,推进既有“不平衡”“不合理”治理机制深刻变革。

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重点突破口,深化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气候变化问题。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一方面主动融入全球低碳发展的浪潮当中,加强与国际组织、先进国家和地区、国际企业及机构等的合作交流,为实现低碳发展创造机遇;另一方面切实履行国际社会达成的一系列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框架协定,努力推进能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全球合作与国际协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力量。二是贫困问题。2020年,中国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但与此同时,世界仍有超过2.8亿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1.2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中。因此,中国要积极总结精准扶贫的典型经验,继续谱写人类反贫困的新篇章。三是难民问题。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1年全球趋势报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调查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因战争、暴力和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为8930万,其中儿童人数达到3650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数字。因此,世界各国一方面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努力筹集资源,根据国际法向难民提供必要保护;另一方面要坚持发挥联合国及难民署等多边机构主渠道作用,完善国际难民保护体系。

(三) 诚实守信、互商互谅,以加强战略互信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

诚实守信是消解“信任赤字”,促进互利互信的关键。破解全球性难题需要治理主体同心协力,而信任则是多方合作中最好的黏合剂。因此,各参与主体要相互尊重、以诚相待、信守承诺,摒弃零和思维,注重共同利益,谨防“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背信弃义之举。中西方虽有文化、习惯差异,但中国守诚信的价值理念同西方的契约精神有着相似的内涵。中国历来讲究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始终秉承诚信原则,强调以互利共赢来促进更深层次的合作。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秉持诚信,恪守承诺,以实际行动构筑更加坚实的互信基础。

树立诚实守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履行诺言构筑互信基础。多年来,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全球减贫、捍卫多边主义以及疫苗援助等诸多方面兑现了对国际社会所作出的郑重承诺,塑造了守信用、讲信义的良好大国形象。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磋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实施了100余个有关救灾、卫生、妇幼、难民、环保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中国积极兑现支持全球抗疫合作的承诺,已经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1亿剂疫苗;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以实际行动落实一系列减排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在联合国各项事务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包括维和任务等,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力量。中国理念与联合国所倡导的多边主义等原则高度契合,与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方向一致”^①。对于不遵守约定,不履行承诺的国家要建立健全国际信任监督机制(吴志成和李佳轩,2020),运用国际法规、国际组织规章、国际条约等国际规约以及借助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和督导,从而增加国家的投机成本,使欺骗行为不得面对声誉流失、他国的惩罚性不合作以及被国际社会排斥等风险。

完善全方位多领域的对话机制,在共同叙事的合作中增进全球信任。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化解分歧和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是破解“信任赤字”、促进互利互信的首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②。换言之,相互尊重是有效沟通的重要前提,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是沟通的基本原则,对话协商是沟通的主要方式。在国与国交往的过程中,有摩擦、有分歧是难免的,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发展才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因此,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对话沟通机制,有利于管控和化解分歧。同舟共济,加强合作,在共同发展中建立信任关系是增进战略互信的关键。信任是一种主观判断,体现着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度量。因此,不论是理性选择主义的契约型信任还是社会心理分析中的关系型信任,都强调主体的主观评估性,二者在实践中具有相辅相成的特征。在国际合作中,知行合一、言出必行体现了行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基本品格,为信任的生成创造了条件。由此,合作方在共同叙事中的“共同进化”有助于提高国家间的同质性认识。与此同时,信守承诺的国家在合作中积极有效的互动,将促使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的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各个国家之间的协商、沟通和合作,能够有效消解彼此分歧,消除误会误判,增进全球信任。

^①王宗英.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中国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N/OL]. 央广网, 2020-09-23[2021-12-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610142341340578&wfr=spider&for=pc>.

^②习近平.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N]. 人民日报, 2019-03-27(3).

(四) 公平正义、规范透明,以维护国际规则和各国共同利益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方向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提供重要力量。

促进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确保具有平等的准入资格和公平的管理权利。第一,以共同利益为基准点,确保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规则谈判和制定过程中的机会公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①。因此,各个国家都应当有平等的准入资格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及协定,同时能够以国际通用标准来推动自身发展,持续增强自身在国际合作中的实力和底气。第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参与全球治理的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基于规则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因此,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国家参与进来,并根据权责对等原则,不断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以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为决策标准,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崇正义是基于人类良知和理性的至善,以行为的正当强调对分配公平和权利平等的追求。在全球治理中,崇正义就需要治理主体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标准,来衡量治理行为的正当性。因此,只有符合这一价值理念的决议才能够被世人所认可。例如,冷战期间,大多数国家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实行了制裁,这不仅有联合国大多数国家投票支持的决议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因符合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具有正当性。相反,以权力优势进行战略威胁,重视一己之私而损害他国利益的做法则不具有正当性,必将被世人所批判。现实中,人类社会还存在着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恐怖袭击和无端制裁等一系列非正义行为,严重危害着世界和平。因此,全球治理需要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以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准,持续完善治理体制机制。

(五)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以推动文明互鉴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

“和合”思想,讲求“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和而不同”,有助于社会和谐相处、文明交流互鉴、世界和平发展。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能够有效化解摩擦,消除分歧,推动社会和谐相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小国家相互尊重、一律平等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联合国宪章首要原则”^②。相互尊重,以和为贵就是指世界各国一律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当面临利益冲突与认知差异时,应平等相待,用包容、谦虚的态度了解彼此,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公约数,以化解分歧,促进合作。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世界各国和平相处提供了理论遵循。“求同存异”方针是“和合”思想的智慧结

^①习近平. 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N]. 人民日报, 2021-07-07(2).

^②习近平.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22(2).

晶。其中，“求同”是求和平合作之同，“存异”是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异。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充满智慧的相处之道、治理方案，正是因为“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总结的规律，其延伸出来的宽容精神、道德追求、包容意识深深刻在了人民的骨子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①。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积极做世界和平稳定贡献者、推动者和捍卫者，既享受世界和平的红利，又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机遇。感谢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工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②。

和而不同的理念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夯实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③，“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④。世界正是因为有了差异，才多姿多彩，正是因为有了分歧，才需要聚同化异。和而不同的目标是在动态变化中寻求平衡、和谐。因此，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积极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互学互鉴，共同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多彩世界。

（六）胸怀天下、互惠共赢，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崇高理想

胸怀天下，互惠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以万民苍生为旨归，“兼济天下”，“协和万邦”，追求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繁荣的崇高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对“大同”社会理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改造与革新，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理想追求和聪慧的精神智识。

共建多边互惠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当今世界，全球治理要关注共同的发展利益，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⑤。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时表示，“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

^①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16(2).

^②新华社.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N/OL]. 新华网, 2021-10-25[2021-12-10]. http://m.news.cn/2021-10/25/c_1127992874.htm

^③习近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4-03-28(3).

^④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 2019-05-16(2).

^⑤习近平.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6-11(3).

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①。中西方的制度虽有不同之处，但各国谋求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各国的利益交融更需要我们命运与共、合作共赢。因此，一方面要坚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持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全球经贸秩序；另一方面支持开放融通，深化互利合作。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大趋势，各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方向，将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共谋和谐相处的合作型安全格局，保障人类社会长久和平。随着全球化的深刻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国民之间、族群之间的交往愈发密切，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人类历史也就实现了从地域性的民族史向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史转变。一方面，区域性生产和消费变成了由资本支配的世界性消费，国家的发展就愈发受到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以及世界市场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的限制；另一方面，一国的经济动荡和政治冲突也可能会通过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蔓延到整个世界，并扩展成为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刘同舫，2018）。由此，世界各国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因此，全球治理需要坚持和睦、和谐、和平的理念，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首先，深刻领会“和合”思想中尊重差异、平等相待、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丰富内涵，推动国际关系友好发展；其次，将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再次，积极拓展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弘扬伙伴精神，通过平等协商、管控分歧、扩大共识等方式不断提升伙伴关系含金量；最后，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协调，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统一。

[参考文献]

- [1] 蔡拓.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1): 94-106+207.
- [2] 陈锦华. 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4.
- [3] 陈晓芬, 徐儒宗.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论语 大学 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271.
- [4] 邓勇. 王霸: 正义与秩序[D]. 武汉大学, 2007.
- [5] 方勇.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孟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97.
- [6] 冯契. 冯契文集: 第四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73.
- [7] 基辛格. 论中国[M]. 胡利平, 林华, 杨韵琴,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517.
- [8] 李怡, 肖昭彬.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与现实意蕴[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7): 26-33+159.
- [9] 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7): 4-21+204.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69.
- [11] 门洪华. 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10): 36-46.

^①杨洁篪. 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N]. 人民日报, 2020-08-08(6).

- [12]王世舜,王翠叶.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尚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69.
- [13]吴志成, 李佳轩. 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J]. 政治学研究, 2020(6): 24-36+125-126.
- [14]吴志成, 刘培东.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4): 20-41+138-139.
- [15]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下)[M]. 北京: 商务印刷出版社, 2018: 884.
- [16]徐浩, 赵景峰.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与对策[J]. 宏观经济管理, 2022(3): 77-82.
- [17]阎学通. 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J]. 国际问题研究, 2013(1): 6-14.
- [18]阎学通. 世界权力的转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92.
- [19]杨国荣. 重思正义——正义的内涵及其扩展[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5): 64-80+205-206.
- [20]俞可平. 重新思考平等、公平和正义[J]. 学术月刊, 2017, 49(4): 5-14.

Chinese Wisdom on Global Governance

XIA Wenbin, GUO Dongshe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Maintaining glob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global governance today. How to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olve the global governance problems requires us to seek wisdom from the Chinese culture with a 5000 year histor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lifeblood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and essen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hape the val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make global governance more equitable and rational.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Proceeding from the value functions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preaching benevolence and love, emphasizing people’s principles, abiding by honesty and integrity, upholding justice, promoting harmony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this paper actively explores new paths for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Chinese wisdo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imes Value

(责任编辑 刘建昌)